

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意义

——基于人口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分析*

傅 勇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摘 要: 本文首先辨析了人口流动模型中的刘易斯模式和托达罗模式的关键分歧, 即农业劳动者在城市的工资是如何决定的; 在此基础上, 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没有显著提高农民的收入, 以及巨大的城乡差距为什么没有导致农业劳动者在城市中的大量失业。城市中存在着结构失衡的二元劳动力市场, 农业劳动者主要就业于低层次市场, 要加快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就要大力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缓解这种失衡。

关键词: 人口流动; 城乡差距; 二元劳动力市场; 人力资本投资

中图分类号: C922; F2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4)03-0055-05

The Influence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on the Surplus Rural Labor's Transition ——A Study Based on Population Floating and Labor Market

FU Yo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City, Anhui Province, 230039)

Abstract: Firstly, the paper clarifies the key divergence between Lewis Model and Todaro Model in the field of population floating: how the wages of the peasants-workers in cities are determined. Based on this, we explain why the large scale floating flows have not enhanced the peasants-workers' income, and why the huge rural-urban gap has not led to serious unemployment of rural labors in cities. The dual labor market is unbalanced. The peasants-workers are mainly involved in low-end labor market. In order to accelerate labor transition, we got to increas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to relieve the unbalance.

Keywords: population floating; rural-urban gap; dual labor market;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新中国成立之初, 我国就存在较大的城乡差距, 为了限制城乡间人口的“盲流”, 上世纪50年代末逐步形成我国的城乡分割体制。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对不均衡认识的增加和流动经验的积累, 市场机制以其不可遏止的力量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民工潮”。然而6000万至1亿的流动人口对消除城乡的巨大差异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民纯收入的1.86倍, 而1990年、1995年、2000年和2001年这一数值分别是2.20倍、2.72倍、2.79倍和2.90倍。从国际比较发现, 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 还是原计划经济转轨国家, 这一比率大都低于1.5^[1]。

收稿日期: 2003-05-12

作者简介: 傅勇(1979-), 男, 安徽霍邱人,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 感谢安徽大学经济学院荣兆梓教授的鼓励和建设性评论, 但文责自负。

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状，显然与我国实行的城乡歧视性政策有关。然而，要素均等化理论告诉我们，城乡之间大量的人口流动必将消除大部分的城乡差距，那么，为什么我国农民收入没能随人口流动而显著提高并拉平城乡差距呢？再者，巨大的城乡差距也没有造成农业劳动者在城市的大量失业，应该说城市的失业压力主要来自于城市下岗工人，这也和经典的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相悖。由于农业劳动者自主地决策是否进城，并且进城后就业于市场的市场主导部门，所以对人口流动机制和劳动力市场的分析将提供上述问题的答案。

一、人口流动模式：刘易斯的，还是托达罗的？

分析人口流动的经典模型，是刘易斯和托达罗分别于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末、70年代初创立的。刘易斯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出发，假定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城市现代部门可以固定工资获得无限的劳动供给，这促进了资本积累和工业发展，并不断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变二元经济为一元经济，从而肯定了人口流动的积极意义。托达罗模式旨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六七十年代出现的城市高失业率和人口仍持续从农村流入城市的现象。他假定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农民边际生产率大于零），而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城乡收入存在着较大差别，这诱使农村人口持续流入城市并在城市中等待就业，导致严重的失业问题^[2]。

可见，这两个模型在前提假定和政策含义上是对立的。然而两者的关键分歧在于农业劳动者在城市的工资是如何决定的。刘易斯假定城市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的，工资起着调节机制，则市场出清，不存在失业。在托达罗那里，城市工资被假定由外生的制度因素（政府的最低工资法和工会的垄断力量）决定，并呈上升趋势。此时，城乡巨大的实际收入差别将吸引农业劳动者承担失业的风险进入城市，并留在城里寻找工作。这样，城市工资越高，城乡差距越大，城市的失业率越高。其中的调节机制在于失业率的上升而不是工资。

我们从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式开始讨论这两个模型的区别。假定农民理性地通过比较城乡预期收入决定是否进城：

$$m = f(d) \quad f'(d) = +\infty \tag{1}$$

$$d = (w\pi - c) - r \tag{2}$$

其中， m 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数， d 表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 w 表示农业劳动者在城市的工资， π 是农业劳动者在城市的就业概率， c 表示各种流动成本， r 指在农村就业的预期收入，它取决于农民的边际生产率。 $f'(d) = +\infty$ 表示，当 $d > 0$ 时，农村劳动者将无限流入城市，如图1， d 具有无限大的弹性。值得注意的是刘易斯实际上认为就业概率 π 恒等于1，从而 $d = w - r - c$ ，在假定 r 、 c 不变的情况下， d 仅由 w 决定， $f'(d) = f'(w) = +\infty$ 。所以图1、图2虽然都是水平的，但纵坐标是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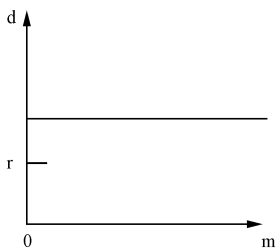


图1 托达罗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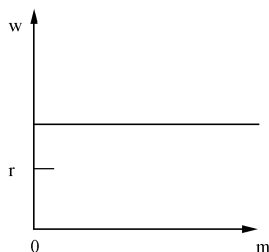


图2 刘易斯模式

我们把两条曲线画在同一个图中作进一步讨论。

刘易斯认为城市的工资由农村收入决定，在农村剩余劳动力（ $0m_s$ ）全部转移之前，城市部

门以固定工资 $w_0 (= r + c)$ 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虚线为托达罗曲线（更规范的推导参见附录），表示人口流动和城市失业率与城市工资之间的正向关系。假定城市部门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需求为 D_1 ，如果城市工资被固定于 w_0 ，将有 $O m_1$ 数量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且就业概率为 1；一旦由制度决定的城市工资大于 w_0 ，劳动力市场将供大于求，城市就业概率将小于 1，并随流动人口的增加而降低，直到城乡预期收入相等时为止。例如，当工资定为 w_1 时，城市失业率为 $\pi = (O m_b - O m_a) / o m_b \%$ ，而此时， $d = 0$ ，从而 $w_1 \pi = w_0 = r + c$ 。因此，就业概率小于 1 时，高工资弥补了进城失业的风险，但期望收入不变。完全市场化条件下，对应的是刘易斯曲线，市场将在 E_1 处出清，没有失业。实际上，在剩余劳动力未被完全转移之前， w_1 仅是“虚幻”的工资，即使城市需求增加到 D_2 ，因农村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市场仍在工资 w_0 处出清，只是就业人数增加到 $O m_2$ 。 E_2 后面的虚线是另一条对应于 D_2 的托达罗曲线。所以在市场化条件下，永远不会处于托达罗世界，而总是处在刘易斯世界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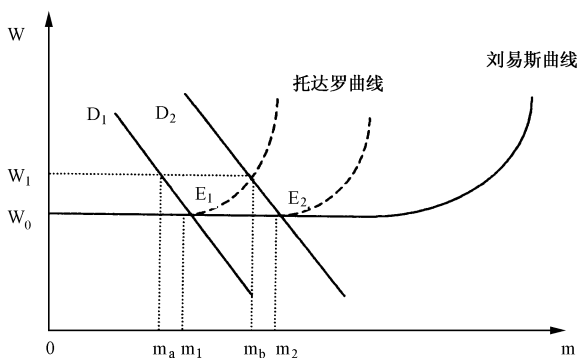


图3 刘易斯曲线和托达罗曲线

乍一看，我国是两个模型的综合情况：农村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平均劳动生产率很低，城乡差距引起劳动力的无限流动；城市存在一定的失业。然而，我国转型经济的特点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城市中存在着明显的二元体制：计划控制部门和市场主导部门。前一部门的用工制度由政府严格控制，缺乏激励和流动机制，收入分配有平均主义的倾向，可以说这类部门的工资或收入由制度决定；后一个部门供求双方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由决策，工资水平完全由市场决定。这样，如果农业劳动者进城通过较完全的劳动力市场就业于市场主导部门，那么人口流动就是刘易斯的；如果就业于计划控制部门，工资由制度决定，人口流动就是托达罗的。中国的现实显然属于前一种。

二、城市中转移劳动力的市场均衡和对现实的解释

一旦确定我们处于刘易斯世界时，前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大规模人口流动存在的条件下，农民收入没有显著提高、城乡差距有增无减的原因可归为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正如刘易斯后来所发现的：即使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城乡差距也不是海滩，而是悬崖。均衡时，农业劳动者在城市的工资超过农村收入的部分被流动成本 c 抵消 ($c = w\pi - r$)，中国由于存在许多制度障碍，流动成本是相当大的。它包括房租费、家庭分离的不便、子女教育问题、路费、较高的生活费用、办理各种手续的费用、寻找工作成本，甚至各种心理负担成本。政府为了保护城市工人免受农业劳动者的竞争威胁，人为地增加了其流动成本，上面提到的大部分流动成本都与政策有关，尤其是户籍制度的延迟取消^[3]。

其次，农业劳动者在城市就业的工资收入被固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一方面，农业劳动者在农村收入较低，纯收入更低，使得其在城市就业的机会成本很低，决定了刘易斯曲线处于较低的

位置 (纵截距 r 较小); 另一方面, 城市劳动力需求还不足以吸收全部的剩余劳动力 (富人人口 1.5 亿左右, 流动人口最多在 1 亿以下), 所以农业平均劳动生产率、进而收入还未能因农业人口的转移而得到明显提高, 即目前仍处于刘易斯曲线的水平段。这样无论农民选择进城还是选择务农, 其收入都不高。

最后, 撇开流动成本的抵消作用来看, 城乡差距可分解为: 计划控制部门高于其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工资和福利政策, 这些部门农业劳动者无法进入, 这部分差距处于制度保护之内, 因而不能通过人口流动或市场机制解决, 这是导致我国城乡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 以及市场主导部门, 因劳动者素质上的差异而导致的合理的收入差距 (还有财产收入带来的差距等), 农业劳动者因其只具有较少的人力资本禀赋而在城市中只能获得较低的报酬, 这也是人口流动没能缩小城乡差距的原因。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 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的一元化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都有赖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我们认为, 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必然是个市场过程, 必须通过劳动力市场解决。因而, 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也将有助于提出前瞻性的战略对策。

三、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及其结构性失衡

中国人口众多, 平均人力资本较低, 而且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明显的因人力资本禀赋不同而形成的劳动力之间的异质性, 我们简单的将其分为两种劳动力: 拥有人力资本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不具有人力资本的一般劳动力。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形成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两种劳动力在短期内不存在替代关系, 因而可以认为两者分别处于相互独立的两个劳动力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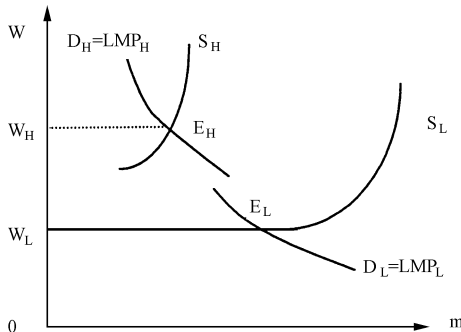


图 4 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及其失衡

在图 4 中, D_H 为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曲线 (同时也是其边际产品曲线), 因其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处于较高的位置, S_H 是其供给曲线, 为获取专业技术而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使其具有较高的生产费用 (保留价格) 而处于较高的位置, 均衡点 E_H 决定了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率 W_H 。在一般劳动力市场上, 考虑到一般只具有较少人力资本的农业劳动者的无限进入, 我们用前面的刘易斯曲线近似地表示这个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曲线的形状。 S_L 、 D_L 、 W_L 分别是图 3 中的刘易斯曲线、城市对农业劳动者的需求曲线及均衡工资。

这种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有着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我国一方面有大量的剩余的劳动力, 如果我国农村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人数的比例达到工业化国家重工业化前期平均 40% 的水平, 将有 1.5 亿剩余劳动力, 并且农村人口还以每年 1300 万人的速度增加, 据保守估计国企职工有 1/3 为富余劳动力, 这部分过剩劳动力也有 5000 万左右, 同时城市人口也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 我国存在着人力资本的严重短缺, 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偏低, 科技人员在人口中的数量和比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4]。另外, 随着经济发展, 对人力资本需求将会不断增加^[5], 尤其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 对人力资本不断产生超前需求。而且, 由于两类工人之间

存在互补性，庞大的一般劳动力要求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与之配合，这将进一步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失衡。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我们的结论是：由于一般劳动力仍处于无限供给阶段，所以农业劳动者在农村的低收入决定了其在城市的较低工资，同时制度原因增加了人口流动的成本，也使一部分城市部门处于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之外，从而人口流动未能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并拉平城乡差距；较低的城市工资也不足于导致大量的城市失业。在劳动力市场上，一般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同时，专业技术人员却供不应求，并且这种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失衡有着日益加重的趋势。人口的顺利转移有赖于就业的增加，也有赖于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缓解这种失衡。

人力资本不同于简单的劳动力；对人的投资形成人力资本，这种投资包括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迁移以及收集价格与收入的信息等多种形式^[6]。人力资本投资一方面通过减少一般劳动力存量、增加专业技术人员的供给而改善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状况。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进而知识和技术进步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并有利于使我国从一般劳动力比较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比较优势，经济的持续增长将加快对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实际上，普遍的人力资本投资缓解劳动力市场失衡的过程主要也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然而我们还应特别强调增加农村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将教育投资向农村倾斜，对转移剩余劳动力的积极作用。据美国学者约翰森（Johnson）分析，中国农民在校时间每增加一年，从事非农活动的可能性就会上升2.2个百分点。

另外，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也有着重大意义。市场的完善不仅优化了劳动力的配置，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它还为人 口转移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一种市场机制。城乡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将保证不会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因为是土地而不是城市政府对进城农民起着最后的保障作用，农民找不到工作时就会返回农村，因而这种人口流动是一种有效的转移。此时只有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才会导致失业问题，所以在取消对人口流动和就业的各种限制的同时，应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使农民形成正确的预期，做出理性的进城决策。

我们把政策建议归结为：在逐步取消各种制度障碍的同时，一是从战略上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意义，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二是培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这两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外部性，需要政府介入其中，特别是对农村教育投资来说，农民这一弱势群体，很难进行和城市相同水平的投资，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倾斜。

最后需要再一次说明的是，我们强调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是基于劳动力市场供给方面的考虑，我们并不排斥那些旨在取消制度障碍、加快农村发展、增加就业的各种政策主张。然而我们坚信，伴随着这些必然的改革和发展趋势，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长期存在的现实下，必须要有不断增加的人力资本投资相配套。（附录略）

参考文献：

- [1] 陈钊、陆铭. 教育、人力资本和兼顾公平的增长 [J]. 上海经济研究, 2001, (1).
- [2] 谭崇台. 发展经济学 [M].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1: 278- 286.
- [3] 蔡 、杨涛. 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 (4).
- [4] 李建伟. 劳动力过剩条件下的经济增长 [J]. 经济研究, 1998, (9).
- [5] 舒尔茨. 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 [M]. 见: R. 科斯, A. 阿尔钦, D. 诺斯.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251- 265.
- [6] 贝克尔.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5.

[责任编辑 崔凤垣]